

河池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系列丛书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刘三姐研究资料集

罗岗生 主编
李莲芳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河池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系列丛书

刘三姐研究资料集

主编 罗岗生
李莲芳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

刘三姐研究资料集

主编 罗岗生 李莲芳

编辑 李 波 常树理

李兴坤 邓国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三姐研究资料集/罗岗生,李莲芳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8
ISBN 978 - 7 - 219 - 05937 - 1

I. 刘… II. ①罗…②李… III. 民间文化—研究—广西—文集
IV. G127. 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117 号

责任编辑 李带舅

刘三姐研究资料集

主编 罗岗生 李莲芳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印 张 41
字 数 117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19 - 05937 - 1/G · 1441

定 价:1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
(河池学院 系列丛书)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银建军

副主编 温存超 席战强 蓝 柯 钟纪新

编 委 (以姓名笔画为序)

韦广雄	韦丽春	农迎春	何述强	罗之勇
罗岗生	罗相巧	施铁靖	钟纪新	席战强
银云忠	银建军	黄 白	曾宏华	温存超
董塔健	覃福珠	谢 铭	谢春艳	蓝 柯
谭为宜				

总序

银建军

在九万大山山麓，在红水河流过的地方，在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仿佛明珠镶嵌般坐落着一所崭新的高校——河池学院。

2006年，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和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顺利通过教育厅专家组的评审，被批准为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和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

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教学与研究的方向：文学创作人才培养方向、红水河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研究方向、广西当代文学研究方向。这三个方向，在河池学院的大文科建设中，或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或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或具有良好的教研传统，或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或起步于前人尚未充分重视的领域，或具有较前沿的理论开拓与创新……它能成为省级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是有关领导和专家关心、帮助和支持的结果，也是我院诸多教学工作者抛洒汗水、辛勤耕耘的必然收获。

深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写作风气，强烈的走出大山的渴望和追求等，构成了河池学院及其前身河池师专浓郁的文学写作氛围。宜州，地处红水河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桂西北在古代长期于此设置行政官署的古城之一。宋庆历年间三元及第、官至宰相、名扬后世的冯京就出生于此。比冯京晚生24岁的宋代大诗人、大作家黄庭坚因参与改革，被守旧派称为奸党，列名刻石于元祐党人碑，其晚年被除名编管宜州，因其名气之大，亦因此给宜州带来了崇文崇教的良好风尚。在黄庭坚死后不久，宜州人为其建山谷祠，立衣冠墓，并设立了著名的龙溪书院。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于1638年春在宜州探险揽胜，体察风物，前后历时一月，在其名著《徐霞客游记》中，留下了41页共计两万多字的优美文字。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率军辗转西南时，亦曾于宜州驻军，并率其部将于宜州城北会仙山上吟诗斥佛，后人将其与部将的唱和诗章勒石于壁，于今已成为白龙洞前著名的旅游景观。民国年间，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及文化名人竺可桢、丰子恺、谈家桢、苏步青、张其昀、胡刚复、马一浮等先后涉足这块土地，推动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风物种种，地灵人杰，使河池学院的前身河池师专自建校始就氤氲着浓郁的古文化气息和文学氛围。

在我们这所学校的文科教师队伍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如刘启真、韦启良、韦秋桐、李果河、温存超、颜新云、钟纪新、何述强等，他们一手教书育人，一手搦笔为文，借文化传统之力，育文学写作之材。而桂西北恶劣

的大石山环境，又常使本地学子产生一种走出山门、闯荡世界的激情。可以说，是这种种因素形成了河池学院良好而浓郁的文学氛围和写作传统，使河池学院及其前身蓬勃发展的校园文学社团现象成为广西及至全国高校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景观。

中国不少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都曾投以关注的目光，或前来讲学，或挥毫题字，或捐赠书籍、资金，或为之出谋划策。

正是在这样风调雨顺的大气候中，“好风凭借力”，终于崭露了像东西这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像凡一平这样获得广西铜鼓文学奖及以电影《寻枪记》创下2002年中国电影国产片最高票房而蜚声中国影视界的作家，也崭露了如黄土路、何述强、王卓、钟纪新等一批获得过各种省级文学奖的文学新人，亦因此，河池学院的这一现象曾被外界誉为“河池学院文学现象”。2001年5月，由李果河副教授带头主持的“构建写作社团活动课程，培养高素质、多能型写作人才”的教学研究课题，荣获了广西普通高校第四届教学成果三等奖。

河池学院地处红水河文化的中心地带。奔流不息的红水河千百年来以母亲的情怀滋养哺育着两岸的英雄儿女。这里，居住着壮、瑶、仫佬、毛难、苗、侗、水等八个少数民族，包括全国只此一个的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环江毛难族自治县。各民族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学，金色的铜鼓、五彩的绣球、斑斓的壮锦、别致的干栏、连情的歌圩、神秘的傩戏……它们以独有的民族特色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里，既产生过贫困也一直蕴藏着富饶，既有过叹息也一直点燃着希望。这里，就是被誉为“水电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长寿之乡”、“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和“红七军的故乡”的五“乡”之地——河池市。红水河上拟建的10个梯级电站有4个在河池市境内，现已建成了3个，即将建成的龙滩水电站，其年发电量仅次于三峡电站。南丹及罗城的锡矿蕴藏量及开采量也仅次于云南个旧，被誉为世界第二“锡都”。据2006年2月统计，巴马县百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已远远高于世界已被确认的四个“长寿之乡”（俄罗斯的高加索、巴基斯坦的罕萨、厄尔多瓜的比尔班尼、中国新疆的南疆）。歌仙刘三姐以其美丽善良、嫉恶如仇、机智善唱的形象赢得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刘三姐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壮族集体深层潜意识和古壮族淳朴热烈、刚直爽朗的民风，到今天，“刘三姐文化现象”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而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在东兰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更是红水河文化史册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未能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和应有的作用。作为身处这一文化中心地带的河池学院，理应在这方面发挥出更多的研究优势，有所突

破和进展。

河池出作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要开列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河池籍作家的名单，这个单子可列出长长的一串。对于当代广西文学和河池作家的关注，是我院的一个优良传统，我院教师注重对广西当代文学创作的研究，评论广西作家作品，形成了河池学院文学评论方阵，学校学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辟“广西作家研究”专栏，对广西文学创作的理论探讨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与贡献。早在80年代末东西、凡一平初涉文坛之时，河池师专教师即向人们推荐和评价这两位有前途的文坛新人。此后，又先后于1993年12月、2000年12月主办了“凡一平、东西(田代琳)文学作品讨论会”(广西作协、河池日报社、三月三杂志社协办)和“桂西北作家群研讨会”(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广西作协、河池师专联合主办)，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和记者参加讨论，并刊发讨论会纪要和相关评论文章，形成较大的影响。近年来，我院一批年轻教师在这方面又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项研究对于促进广西的文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比较新颖和前沿的，但愿它也能像广西作家一样不断地给世人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现在，以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研究、红水河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研究、广西当代文学研究为支撑点的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已成为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这是上级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也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为了展示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成果，我们出版“河池学院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们抛洒汗水、辛勤耕耘的一个收获，但愿它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同时，也是怀着抛砖引玉之心，我们期望着有更多的兄弟院校及专家学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使我们前行的步伐能更快一些。如果数年后，本学科能成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那将是我校的荣幸，也是桂西北的荣幸。

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愿我们的身后也能有一条路，数年后回首，深深浅浅，皆是跋涉的足印。

是为序。

2006年8月19日



前言

刘三姐是广西壮族地区自古流传的民族楷模，尤其是桂西北地区，世代奉其为“歌仙”。自50年代初期刘三姐故事形成体系以来，由传说到舞台，由舞台到银幕，使刘三姐成了广西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东南亚地区也颇有影响。对刘三姐的评论和研究成了无数刘三姐爱好者的又一欣赏平台，无论是对刘三姐和《刘三姐》的赞美还是批评（有时可能持某种否定的态度），都是对刘三姐的关怀和呵护。因为，没有刘三姐维系，我们就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论争，因而，围绕“刘三姐”这个核心所作的任何评论和研究，都是对刘三姐这种文化现象的肯定。

近来，对刘三姐的研究比之先前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其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赞美、批评或建议上面，而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比较，并和当前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宏观又有微观，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板块，有人谓之“刘三姐文化”，编者十分欣赏这个观点。我们的这本资料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催生的，相信对刘三姐文化的研究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历世界经济大潮冲击的同时，将伴随着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诸方面的冲击。为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傲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就必须大力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用之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入侵。刘三姐文化现象、刘三姐文化品牌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研究它、充实它、利用它，就能有效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使之走向世界。

编者

2007年8月

刘三姐、《刘三姐》及其他

(代序)

李莲芳

一、刘三姐和《刘三姐》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在这几经桑田的歌海之中，曾涌现出千千万万山歌之王，而最为耀眼之星无疑首推刘三姐，刘三姐是民间歌手们心目中的启明星、歌圣、歌仙。人们常于口头的“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歌句，表达了历代歌手们对刘三姐的崇敬和最高评价。

刘三姐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有关她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广西、广东、云南、湖南等地都可以追循到她的踪迹和绕梁之余音，广西各地如宜州、柳州、罗城、贵港以及德保、巴马等地都有其传说和记载。宜州《庆远府志》载：“刘三妹，相传唐时下枳村壮女，性爱唱歌”。《浔州府志》载：“刘三妹生于唐中宗之神龙元年。”

《粤述》载：“唐景隆中，贵县西山有刘三妹者。”《苍梧县志》载：“刘三娘，须罗乡人，生于明季。”除了《苍梧县志》把刘三姐说成是明代的人以外，其他各地的志书都认为她生于唐代。尽管记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心愿是都把刘三姐看成是自己家乡的人。

刘三姐虽为公众所知晓，但她只是一尊飘忽不定的“歌仙”。说她是“歌仙”，但却没有一首“传世”山歌留给后人，说她不是“歌仙”，而她又实实在在地伴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山歌这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歌仙”，必然会在人们的心中淡化以至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这样的时代精英，这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

把刘三姐从“神”（仙）回复到“人”，是无数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努力发掘、塑造的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覃桂清和肖甘牛，是他们最先发掘这块埋藏于民间的宝玉。覃桂清原为宜山县文化馆干部，为了收集刘三姐的故事，他曾跑遍了下枳各个村寨，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料。1955年他因工作的需要调离宜山县（宜州市前身。下同）时，就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素材交给宜山高中老师肖甘牛，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刘三姐故事的收集整理工作。肖甘牛再次深入下枳各村寨，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1955年底，上海《新观察》发表了肖甘牛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刘三姐》，从此，一个有血有肉的刘三姐来到了人间。

在刘三姐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前，宜山的“刘三姐热”就已经开始了。1953年，宜山教师邓昌龄根据民间流传的有关刘三姐的故事，创作完成了五场彩调剧《刘三姐》。1955年至1956年8月间，宜山县文化馆干部罗茂坤、副馆长周伟和彩调艺人吴老年合作收集整理了长篇叙事诗《“歌仙”刘三姐》在《宜山农民报》上发表。

同时，一些文艺工作者便尝试着把刘三姐搬上舞台，1956年，该县龙塘村以山歌剧的形式演出了《刘三姐》，这是刘三姐第一次在舞台上亮相。该村还采用墙报的形式设立“刘三姐歌台”，发表群众自己创作的山歌，歌颂新社会。1956年12月宜山县桂剧团演出了“搭桥戏”（一种没有文学剧本、只根据其故事情节在舞台上靠演员临时发挥的原始剧）《刘三姐》，引起了轰动，柳州、桂林曾派人来观摩。由于经费等原因，宜山县桂剧团无力排演邓昌龄的剧本，于是邓昌龄就把这个剧本寄到广西省文化局，文化局的有关同志又把这个剧本转给了柳州市彩调团，柳州市彩调团根据邓昌龄这个剧本的思路进行了再创作并进行尝试演出，取得了成功。

二、《刘三姐》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1959年初，柳州市彩调团在邓昌龄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加入到了大量的山歌，经过试演，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再由编剧人员反复修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第三方案”。“第三方案”进行公演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使剧本更加完善，创编人员又上北京征求全国剧协的意见，得到贺敬之等同志的肯定和帮助，多次进行座谈修改，使“第三方案”更臻完善。《广西日报》在当年8月底至9月初以五期副刊的全部篇幅全文刊登了“第三方案”，使“刘三姐热”迅速向全区蔓延开来，对其创作和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宜山县业余文艺代表队对“第三方案”又进行了大胆的修改和补充，在县人民礼堂首演，连演半个月，场场爆满。先后曾到罗城、柳州、石龙、梧州、贺县（贺州）、桂平、平桂矿务局和百色等县市演出，获得了成功。在百色演出期间，对百色地区专业剧团《刘三姐》剧组人员进行一对一式的辅导，得到百色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好评。1959年11月底到南宁作《刘三姐》汇报演出，前后演出9场，轰动了南宁市。区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大将张云逸以及区党委其他领导观看了该团的演出，予以充分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区党委宣传部根据宜山县演出的效果和群众的反映，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对《刘三姐》的大讨论。区文化局、《广西日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有关《刘三姐》主题、场次、唱词、音乐、舞台美术以及表演等方面的座谈。《广西日报》连续三天以第三版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对当时该剧的修改、提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刘三姐》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区党委书记韦国清、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以及区党委很多领导同志都看过《刘三姐》剧的演出并对该剧的改编和提高作了指示。区党委指定由伍晋南同志重点抓《刘三姐》的修改和演出工作，把《刘三姐》当着全区文化工作的重点来抓，在全区范围内掀起大演大唱《刘三姐》的高潮，向党的四十周年生日献礼。

1960年4月11日全区拉开大演大唱《刘三姐》的序幕，六个专区的代表团和区直创作人员、演员共1400人以及各县的观摩代表参加了这次汇演，这是在全区以“刘三姐”为中心的群众文艺运动的基础上举行的。据统计，全区演出《刘三姐》的单位有1209个，参加的演员58000余人，“百色、柳州两个专区几乎一百多、两百人中

就有一个人参加了‘刘三姐’的演出。全区看过《刘三姐》的观众约 1200 万人次”^①。群众不仅热烈欢迎“刘三姐”的演出，盼望“刘三姐”的演出，还热情地为剧团推荐演员，介绍故事线索，百色、桂林的老人还为汇演提供可贵材料等等。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玉林专区文工团，上演“刘三姐”后收到观众的赞助和建设性意见的信件达到 1000 多件。区直各剧团、各地市县文艺团体都在排练积极参加全区汇演，这种自觉的、大规模的、战役性的和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不但在全广西乃至在全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扮演刘三姐的演员，是刘三姐剧中最为关键的角色。各代表团往往对这一角色要求极为严格，常配备一、二线演员。各地演出的“刘三姐”，都是各地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塑造的，正如人们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所说的“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刘三姐。尽管如此，刘三姐贯穿于整个演出过程的主线是基本一致的。刘三姐形象是集中了众多“刘三姐”的优点而形成的。

三、《刘三姐》是部千锤百炼的杰作

1953 年邓昌龄创作的彩调剧《刘三姐》分为五场：田野、河堤、村舍、庭院和山林。主要剧情为：刘三姐和两个歌王对歌，歌王败；三姐兄刘二反对三姐唱歌，欲将三姐溺水，三嫂反对，乡亲们求情；还乡御史莫云派打手到刘家抢亲，三姐和莫府歌姬李玉莲合谋将莫云灌醉，三姐出逃；八名仙女接三姐上天成仙。这就是最早的彩调剧《刘三姐》剧本。

1957 年 5 月，宜山（宜州）人民桂剧团根据肖甘牛提供的民间故事，以“搭桥”形式排演桂剧《刘三姐》。全剧分八场：1、刘三姐和众男歌手对歌；2、财主带小子（仆人）游山玩水，因调戏三姐被三姐打了一个耳光，财主立誓要娶三姐为妻；3、媒婆、刘二劝三姐出嫁，三姐反对；4、刘二令三姐一晚上捡艾 80 斤，因天黑分不清草和艾，三姐唱歌，唱得云散月明，完成捡艾任务；5、财主以势令三姐每天砍柴 800 斤，三姐唱歌感动群兽，老虎、猴子、兔子、山羊来帮忙；6、两名广东歌王慕名来和三姐对歌，歌王败；7、刘二逼三姐嫁财主，三姐反对，被锁房内，大牛营救，和三姐一同逃走；8、财主追捕刘三姐，三姐逃到鲤鱼岩跳下龙潭成仙。

1958 年，在邓昌龄第一稿和桂剧搭桥剧的基础上，柳州市彩调团经过改编形成了比较完整剧本“第三方案”。全剧分为七场：1、中秋节对歌；2、逼债；3、说媒；4、对歌；5、禁歌；6、离家；7、成仙。从邓昌龄本到“第三方案”，尽管分场或多或少，其中心仍然不变，即对歌、逼亲和成仙，而对歌一场戏总是全剧的高潮。

在“第三方案”的基础上，各剧团、文艺演出单位都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改编加工，在“第三方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第五方案”、“第九方案”等。柳州地区的“第五方案”保留了第三方案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主题，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以劳动人民与地

^① 区党委宣传部长葛震在全区“刘三姐”汇演大会上的讲话

主阶级两种文化思想的斗争作为主线，对人物的刻画方面做得也比较成功。

区彩调团虽采用“第三方案”，但作出了较大的改动，增加了地主少爷和韦老奶两个人物。桂林专区代表团演出的剧本，是在地委、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五次大修改，增加了“开堂”这一具有桂林地方特点场景。南宁专区代表团根据本地区关于刘三姐的传说对剧本进行了改编，由原来的十场改为八场，后来又改为六场，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玉林专区代表团对原有剧本也进行了大胆的改动，在曲调上也进行了大胆尝试，把桂南山歌和采茶结合起来，有独唱、有齐唱，也有合唱，大大地丰富了演出效果。

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编剧乔羽、作曲家雷震邦观看了《刘三姐》的演出之后，决定将其改编拍摄成电影。他们三人来到宜州，游览了刘三姐的故乡下枧，为其秀丽的风光所倾倒。随后邀请了当地著名的山歌手、老艺人座谈，进行采风。艺人黄文祥即席以广西特产水果为题，随口唱出“什么结果抱娘颈，什么结果一条心，什么结果包梳子，什么结果披鱼鳞”，“木瓜结果抱娘颈，芭蕉结果一条心，柚子结果包梳子，菠萝结果披鱼鳞”以及三个秀才唱段“秀才只会吃白米，手脚从未沾过泥，一块大田交给你，怎样耙来怎样犁”、“听我言，我家地田大无边，耙田犁地我都会，牛走后来我走先”等数十首山歌，都直接为电影《刘三姐》采用。

除此之外，乔羽和柳州市宣传部的邓凡平、文教局牛秀和市文联黄勇刹等从收集到的十余万首山歌中对《刘三姐》的歌词进行了筛选和修改，在剧中只用了160余首，每一首唱词都是精心推敲、千锤百炼的结果，真可谓厚积薄发！《刘三姐》之所以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是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分不开的。

《刘三姐》在全国上映以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刘三姐热”，刘三姐成了家喻户晓的电影人物。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部影片超过它的票房纪录。在新加坡，《刘三姐》的票房纪录盖过了美国经典名片《乱世佳人》，而马来西亚则把它评为世界十部十佳影片之一。

四、《刘三姐》之后的思考

每当人们在观看电影《刘三姐》时，在感到美的同时，也有着一些深深的遗，一是画面色彩陈旧，二是刘三姐被莫海仁抓到莫府那场戏，人们为了救出刘三姐，采用武力冲击莫府，本来是用山歌这个文化武器进行斗争的，结果却变成了暴力的决斗。这个场面是时代的产物，在当年“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没有“阶级斗争”这一条“主线”，没有人民群众的暴动的场面，任何作品都是无法通行的，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局限性，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于是乎，一些如鲠在喉的热心人便想重拍“刘三姐”，搞出一个使人没有任何遗憾的作品来。

1996年由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和南宁森美广告公司出资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刘三姐》，是在刘三姐的家乡下枧开机拍摄的，为了这部电视剧，还专门建了一个“流河寨”，剧中大部分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剧组的想法是对的，现在很多

老的题材，经过重新拍摄以后，有了很多看头，如电视剧《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和《沙家浜》等，《刘三姐》如果拍得好，说不定能“风流”一时呢。尽管剧组花掉了数百万元的资金，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当这个电视剧在刘三姐家乡播出的时候，乡亲们先前的多少期望一时间内全部化为泡影，收效甚微。

究其失败原因有二：一是俗气。剧中模仿香港影视搞笑片手法，制造一些不合情理的离奇情节，想以此来提升收视率，结果正是因为这些缘故而大打折扣。二是随意性。随意性是作品的天敌，谁不尊重这个规律，谁就得付出代价。剧组原先仅有一些构思(也可能完成了其中一些)，为了增加集数，拍摄到中途时，便随意加进一些原先并不在计划内的东西，边创作边排演，边拍摄。在导演的提示和示范下，演员则临时进行表演，漏洞百出。而观众在观看这部电视剧时，则先入为主，常常用电影《刘三姐》和它相比较，用电影中的人物来审判电视中的人物，用电影中的情节、结构来审判电视中的情节、结构，这样，电视连续剧《刘三姐》就显得粗糙得多了。

前些时候于报端听说某剧团将重新排练《刘三姐》，据说经过改编了的《刘三姐》其中考虑了当代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预计很可能又一次成为轰动全国的戏剧，等等。注入“现代元素”究竟能不能起到一种轰动效应，能不能别开生面，我们姑且拭目以待，但有些惟妙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的。

记得央视记者曾采访电影《英雄虎胆》当时的原班人马，于洋（饰曾泰）、王晓棠（饰阿兰小姐）以及导演严寄洲都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年拍摄这个戏的一些往事，特别是当曾泰打入到残匪内部时，阿兰为了考验曾泰，证实他到底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派员，于是在宴会上，随着留声机播出的乐曲，扭动着腰肢邀请曾泰跳伦巴舞。这一情节，可谓匠心独运，使观众感到新奇。在当时长期战争的情况下，战事繁忙，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下干部，是不可能知道什么伦巴、探戈、华尔兹的。而曾泰当时只是个侦察科长，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流行于西方的舞蹈，更不用说会跳这些舞了。阿兰的这一招，确实是高明之举，观众都为曾泰捏了一把汗。但在影片中，在阿兰的坚持邀请下，想不到曾泰竟然欣然应邀，萧洒起舞，终于博得了土匪们的信任，最后为歼灭这股残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于对英雄的崇拜，笔者有幸拜访了曾泰这个角色的原型林泰同志。林泰原是四野某部一名侦察排长，在攻打东北四平的战斗中，由于敌军顽强抵抗，我军屡屡吃亏。为了摸清敌人的兵力情况，部队首长命他化妆潜入四平侦察。为了躲避敌人的盘查，他化装成一个疯子，睡在马厩里，身上全是马粪，敌人哨兵见了他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赶紧躲开。这样，他可以出入任何地方，和四平市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收集到十分机密的情报，为解放四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西十万大山剿匪时，又以超人的胆识打入敌人内部，为剿匪又立下了汗马功劳。《英雄虎胆》就是取材于此。

林泰于20世纪60年代是柳州市某区派出所的副所长，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涯和常人不曾经历过的磨难，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得他过度地衰老了。他穿着旧得发白的军装，木然的表情和不善言辞的形象，很难和电影中风流倜傥的曾泰相比。

在他的卧室里，被烟熏得略黄的蚊帐破了一个篮球大小的洞，虽说简朴，却令人心酸。磨得黝黑的枕头套上，“完成任务”四个字依然放射着熠熠的光辉，默默地记录着当年战斗岁月。林泰的夫人是一名小学教师，林泰所有的故事基本上是由她来向我们讲述的，寡语的林泰只是在一旁确认或者作一些补充。看着眼前瘦削的英雄，不禁使人潸然泪下，原型和艺术形象竟然天差地别！

影片中，安排了阿兰小姐这个人，说明当时的编剧和导演在当时那种条件之下，已经是很超前了，很大胆了，特别是阿兰邀请曾泰跳舞的这一段，导演觉得这是曾泰打入敌人内部能否立得住脚，也是最吊观众胃口的情节，可称之为“戏眼”。可是宣传部门在审查该片时，这点就通不过，删去了。编导们不甘心苦心经营的成果付之东流，进入拷贝阶段时，又偷偷地把这些情节接了上去。由于影片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赏，木已成舟，审查部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了了之。片中阿兰那蛇一样的舞姿，那几乎“电”得死人的眼神，曾使无数青年人顿感耳目一新，灵魂出窍，百看不厌。据说深圳有一个老板多次看了这个电影，总觉得那一场伦巴舞会时间太短，有些遗憾，想出巨资重拍该剧。

对于重拍这个戏，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价值，众说纷纭。还是于洋说到了点子上，他说，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今天肯定难拍出当时的感觉了。于洋的话是对的。一部艺术作品，它受它之前历史的约束，无一不是存在的反映，人们力图创作出超越历史时空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英雄虎胆》也是一样，它只能反映解放战争后期那种特定环境下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场景发生了变化，其原先的一些东西便会逐渐淡化。电影中的伦巴舞，这种舞蹈在今天已经是最一般的交际舞了，如果重拍这个电影的话，片中原先最吸引人的地方（如伦巴等），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假若大量注入现代人的“观念”，就很可能出现剿匪事小，言情事大这些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这个“情”字，按照现在某些编剧、导演的想法，曾泰和阿兰除了跳舞之外，很可能还要长时间的拥抱、接吻。尽管十万大山不靠海，也很可能照例出现一大片海滩，两人尽情地（采用太空行走式的慢镜头）追逐、嬉戏，甚至还可能发生其他十分无聊的事情，说不定还会出现“第三者”等等，把一场残酷的剿匪战斗变成了一幕情场纠葛。最后解放军攻入匪巢时，阿兰小姐的下场就会出现多种方式，残酷的战争可能因为“情”而改变其结果——阿兰在曾泰喊出“不准动！我是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的同时舍身挡住同伙射向曾泰的子弹，上演一出美女救英雄的悲剧；也可能在曾泰的教育之下，本来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短时间内产生了质的飞跃，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曾泰递送情报等等，最后为解放军剿灭自己苦心经营的队伍立下大功。也可能……结果实在是不可预料。因此，《英雄虎胆》有没有必要按原先的脚本重新拍摄，这是需要仔细斟酌的。相反，这种带有一定历史烙印的老影片，它仍然可以给我们留下永久的回味，没有遗憾的作品实际上是没有的。

刘三姐自从改编为电影以后，她从中国走向世界，特别在东南亚一带，其票房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经典巨片。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束缚，她必然地带有“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印记。总的来说，瑕不掩瑜，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后，亦有

不少人士试图重拍“刘三姐”，但电影《刘三姐》就像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一样，使人望而却步。人们多次进行的试验之所以失败，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越过（或者绕过）这个高峰，其中所出现的某些情节，比“阶级斗争”还要荒唐。那么，如果在舞台上重新排演《刘三姐》，能越过这个高峰吗？假若偏离了山歌这个主题，再加上现代一些人的娱乐倾向，刘三姐有可能不再是世间人人仰慕的歌仙而可能成为名播四海的武林盟主，莫怀仁请来的三位不是秀才而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或职业杀手。剧中原“对歌”这场戏不再是“唇枪舌剑”而是真正的刀光剑影、血染山河了。这不是我们在作无聊的猜测，君不见，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本来手无缚鸡之力，而在某电视剧中不也成了飞檐走壁、无人能敌的大侠么？

因此我认为，《刘三姐》（包括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尽管给我们留下一些永久的遗憾，但“水至清则无鱼”焉，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点点“遗憾”，《刘三姐》才令人魂牵梦绕，给我们留下那些美好的、无穷的回味。作为编剧导演，在重拍（排）这个早已深入人心的戏剧时，是必须要仔细掂量的。

四、山歌和“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自认为高人一等，一般人（更不用说整日劳作的农民了）在他们的眼里确实是一文不值的，故而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说刘三姐看不起“知识分子”，骂他们是“之乎也者烂秀才”，秀才们不也有“麻雀也与凤凰比，种田哪比读书郎”之句吗？这难道不也轻视刘三姐这些“种田”人么？就是文人与文人之间都尚有“文人相轻”之举，更何况是两个泾渭分明的人群呢。这种相互轻视是历史的产物，是传统儒家文化留给后世社会的一抹阴影，这其中没有谁对谁错，因而不值得拿这些言论来做判断是非的标准。两军对阵，无论长刀短剑，能制敌于死地者为上，比这还要难听的话都不足以为奇，切不可用今天的思维方式或某种标准去对号入座。也不要因为三个秀才是读书人，便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画等号并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

对三个“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来理解：

1. 三个秀才不属于“坏人”，仅充当了“枪手”这个角色。既是莫怀仁请来（无论是义务的或花了重金的）和对方对歌的，三个秀才理应遵守双方所订的“游戏规则”竭尽所学和对方一搏，无论胜负，尽了力就行，结果他们也做到了。这就如同今天法庭上的律师一样，为那些罪大恶极、贪污腐败甚至杀人放火者作辩护，你能说这些律师也是坏人吗

2. 即使三个秀才真和地主老财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时候有这种事情，千万别把“知识分子”都划到正直、清高的范围中去。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投降变节、坏事做绝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南宋的大奸相秦桧，进士出身，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吧；抗日战争时期有知识分子当了汉奸、投敌卖国的，比如汪精卫之流，算大知识分子了吧；解放战争时期也还有知识分子叛变投敌的，比如张国

涛，中国名牌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也算大知识分子了吧。这还不算，就是今天一些受党教育多年、曾受到人民敬重过的、取得了较高地位的知识分子，有的当了中央委员、有的当了省部级领导、地市级领导等等，不也有人站到人民的对面去了吗？不也常有一些腐败分子翻身落马吗？像这些“知识分子”该不该骂，能不能骂？何况此三位老兄仅区区“秀才”而已，尚算不得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分子”呢。

3. 有人认为在《刘三姐》这个剧中，三个秀才被刘三姐这帮“大老粗”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把，使“知识分子”们颜面丢尽，饮恨歌场。饱读诗书的秀才都玩不过“大老粗”，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今后谁还去读书啊？大有“读书无用”论调之嫌。若真的“惹得圣人生了气，从此天下无文章”（剧中唱词），还能有我们今天这些两弹一星、飞天“神六”吗？

毫无疑问，两弹一星、飞天“神六”当然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有一些“大老粗”参与其中），“大老粗”肯定不行，但“知识分子”跑来找刘三姐并不是比造火箭、“神六”而是比山歌的，因而讨论的话题只能是对歌。若真的觉得委屈，就把对歌这个结局倒过来试试，看刘三姐还能不能当上人们崇拜的“歌仙”：对歌开始后，三个秀才满腹锦绣，句句珠玑，山歌如连珠炮一般，仅三两回合刘三姐便“江郎才尽”，无还口之力，终于招架不住而俯首认输。结果三个秀才扬眉吐气，装着莫老爷赏给的半船银子胜利还乡，名播四海。刘三姐则遵守诺言，顺理成章地成了莫海仁的第十房姨太太，过着锦食玉衣的生活，从此“金盆洗手”。这个结果大长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志气了吧！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真是这种结局的话，名满天下的应该是三位秀才才对，有哪条理由使刘三姐能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崇拜？为人们所传颂？还要奉其为神灵？我们用哪条理由来改变这个事实和说明这个结果呢？

《刘三姐》自从有“对歌”这场戏，不管莫海仁请来什么样秀才，都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山歌是流于民间的、以当地口语特别是以大量的熟语、俚语作为基本词汇的交际语言形式，只要押韵或者近韵，无论字句重复与否，无论句子长短与否，就可以随机组合，把要说的话加上“韵”即时发表，且具有“短平快”特点，当属“下里巴人”性质；秀才读的书多般为四书五经，研究的多为文言、虚词之类，所作之诗词曲等，多为古代的书面语（文言），一句之内避免重字、重意（合掌）、讲究平仄、韵律等，要求极为严格。除了使用规范的“诗化”语言外，还需要推敲炼句等，纯属“阳春白雪”了。打一个通俗的比方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同样是一斤面粉，唱山歌的只把它做成煎饼（快餐型），而吟诗者却要做成面包或者点心（品味型），二者都可以填饱肚子，你说谁快一些呢？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并不无一定道理，比如大家都是玩球的，打乒乓球的去打网球或羽毛球试试，搞短跑的去搞跨栏或马拉松试试等等。大家都是读书人，搞数学（或物理学，或生物学，或计算机等等）去写一写长篇小说试试，反之，搞文学的（或文字学，或法学，或艺术的等等）去计算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试试。非汝所长，你能奈何之焉？因此，善于吟诗作对者不一定能随意驾驭山歌这种表现形式，请三位先生来对歌，确实有点免为其难了。